

抗战中的红色刊物

□ 郭秉鑫 程宇一

红色刊物作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路线的思想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报刊以其传播及时性、内容丰富性及信息连续完整性，在传播党的思想、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广大民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方诱降政策蛊惑下更加明目张胆地破坏统一战线，频频制造摩擦。我党从抗战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维护统一战线，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摩擦行为和反共高潮予以坚决反击。为及时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确保正确有效地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涌现出一批围绕推进党建工作、团结人民群众、战略支撑前线三大主题的优秀抗战红刊。

在东北地区，红色刊物结合东北抗战形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正如中共南满省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列宁旗》创刊号所述：“《列宁旗》的使命，就是领导全党同志研究、了解中央及省委的正确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特别是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从而清算在路线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扩大、巩固反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团结各抗日武装队伍，同心御侮。”围绕这一核心工作，该地区红刊登载了大量介绍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其中既包含宏观理论阐述宣传，也不乏具体斗争策略的指导。在陕甘宁地区，红色刊物围绕“抗战建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这一中心工作。1940年2月，《中国文化》创刊，其创刊号题词为“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在苏中地区，中共苏中区委从“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的战略高度考量，克服艰苦的条件，于1943年12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创办《苏中报》，对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的关键时期，《苏中报》及时为根据地军民传递抗战讯息和先进理论。这些红色刊物在密切党群关系的同时，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取得抗战全面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团结广大群众激励人心，营造抗战宣传氛围。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深入且普遍的群众宣传有助于切实动员群众、完成党



1940年4月9日出版的《统一》红五月专号

所提出的任务。

红色刊物以情感动员，有效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增强国家凝聚力。以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为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唤起民众政治觉醒，其选材由反映平民日常生活，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31年，在《生活》周刊开辟的“生活国难残像画报”栏目中，捆绑双手的东北军俘虏和战死的中国士兵尸首分离等漫画，真实揭露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激发了广大群众强烈的抗日斗志。1940年4月9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统一》刊发的《上前线歌》号召“中华民族好男儿们响应祖国的号召，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慷慨激昂的歌词，激励着处于殖民黑暗统治下的群众满怀希望地积极参与爱国抗日斗争，为抗日军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主要在农村地区，中央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为此，《边区群众报》于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并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众化报纸”，报头由毛泽东亲自题写。为办好一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边区群众报》规定必须由文化程度较低的边区籍炊事员和勤务员来参与审稿。这一做法不仅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更激发

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在广大红色刊物积极发挥团结广大群众的作用下，人民群众头脑得到正确的思想武装，抗战热情日益高涨，全国上下营造出强大的革命舆论氛围，呈现出一致反抗侵略的波澜壮阔局面，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公示抗战战绩及宝贵经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在于统一战线的复杂性和抗战任务的艰巨性。基于这一现实，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然之举，而及时公示抗战战绩及宝贵经验，对于稳定民心 and 军心大有裨益。

1928年1月《国民公论》在上海创刊。作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主办的一份重要红色刊物，《国民公论》以“在今天国家民族危机最严重的关头”“唤醒民众，激发士气”为宗旨，刊登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短评，阐述抗战形势与任务，分析抗战时期中国的抗战情况、战时经济、文化运动状况等。伴随淞沪抗战的炮火轰鸣，《抗战》三日刊于1937年8月19日应运而生。该刊主要栏目包括社评、诗作、战局一览、读者信箱等，一方面以巩固统一战线、灌输抗战知识为目的，剖析当时国内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形势；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民间疾苦，为领导抗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被称为“报纸的心脏”，有力锤击着国人的心扉。例如，战局一览



1937年11月18日，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出版的号外

《华北主力战的前夜》中指出：“在战斗中，八路军采取了‘无线战略’。它不会与敌人的主力部队发生正面交锋，却会到处游击，迫使敌人疲于奔命”，以犀利语言评议敌我战术上的成败因素，成为我军部队抗战精神之标杆。此外，《解放》周刊于1937年4月24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创办。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准确反映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抗战情况，发挥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喉舌作用，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这一根本目标而不懈奋斗。

抗战时期的红色刊物，在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鼓舞军民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抗战红刊还培养出一批忠于社会主义、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人才，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摘自2022年11月17日《中国国防报》）



（上接1版）其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大举措；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是增加优质生态环境产品供给、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手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动担当。

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和深远考量，充分展示了党中央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切实肩负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投身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在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不断提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推动区域、城市、产业园区开展减污

降碳协同创新，推动能耗“双控”逐步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加快推进“三线一单”落地落地，围绕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要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统筹PM2.5与臭氧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统筹城镇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统筹传统污染物与新污染物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更大力度解决好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加快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的基础支撑。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抓好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主动承担与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坚决维护我国发展权益。不断深化南南合作以及周边国家合作，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红四军三打龙岩城

□ 吴小龙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在中共闽西特委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红四军一路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22日下午来到龙岩城西的小池乡。当天晚上，红军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关于龙岩城内守敌国民党军陈国辉部的情況汇报，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迅速拟定了攻打龙岩的作战方案。

23日拂晓，红四军兵分两路出发：一、三纵队首先攻占了龙岩城的前哨阵地——龙门圩，并乘胜直抵城下，很快突破守敌在西门、南门的防守阵地；二纵队在地方游击队的引导下，占领了龙岩北门外制高点，并向北门守敌发起猛攻。上午9时许，两路红军击溃守敌，于城内胜利会师，龙岩城遂告解放。

当天下午，红四军为了调动

陈国辉部主力从广东回援，相机加以消灭，于是主动撤出龙岩，挥师攻打永定。5月25日，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永定。从龙岩侥幸逃脱的守敌残部听说红军已经撤走，一面向正在广东的陈国辉报告，一面会同漳平永福的部分敌人重返龙岩城。红四军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出第三纵队二打龙岩。

6月3日拂晓，红四军第三纵队在闽西地方武装及龙岩赤卫队的配合下，分南北两路迅速向龙岩城逼近。城内守敌被打得措手不及，大部被歼，龙岩再次获得解放。5日，红军在龙岩城内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

陈国辉得知“老巢”龙岩第二次被红军攻占的报告后大为惊恐，马上率其主力从广东兼程回援。红四军见敌人中计，于是再次撤出龙岩，转攻上杭白砂等地

的敌人，并制造出即将退回江西的假象。

陈国辉在途中得到红军“即将退回江西”的消息，又接连击退了红军部队的多次“阻击”，于是自以为红军不敢和他交锋，便趾高气扬地率其主力于6月6日“收复”龙岩城，随即在城里举行“庆祝胜利大会”，还宣布放假3天。

18日，红四军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部署了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19日拂晓，在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红军各部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动猛烈攻击，很快夺取了敌人设在城外的阵地，并迅速突入城内，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陈国辉听说红军入城，立刻抛下部队，化装逃走。激战到下午2时左右，红军全歼守敌2000多人，第三次占领龙岩城。

（摘自2022年11月10日《人民政协报》）



『人要上行、叶要上挺』 叶挺：

□ 李 刚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家。启蒙老师陈敬如为其改名“挺”，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冀。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长信，抒其“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20多年都奋战在革命斗争中。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外。1927年8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叶挺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归国，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一年内对敌作战达500多次，毙伤日伪军超过7000人。1940年，叶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谈判时被非法扣押，先后被囚



于上饶、桂林等地。被囚5年多，叶挺不惧国民党威逼利诱，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要“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叶挺终于获释。他出狱后第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希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复电，称赞叶挺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考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摘自202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叶挺：烈火热血铸名将》）